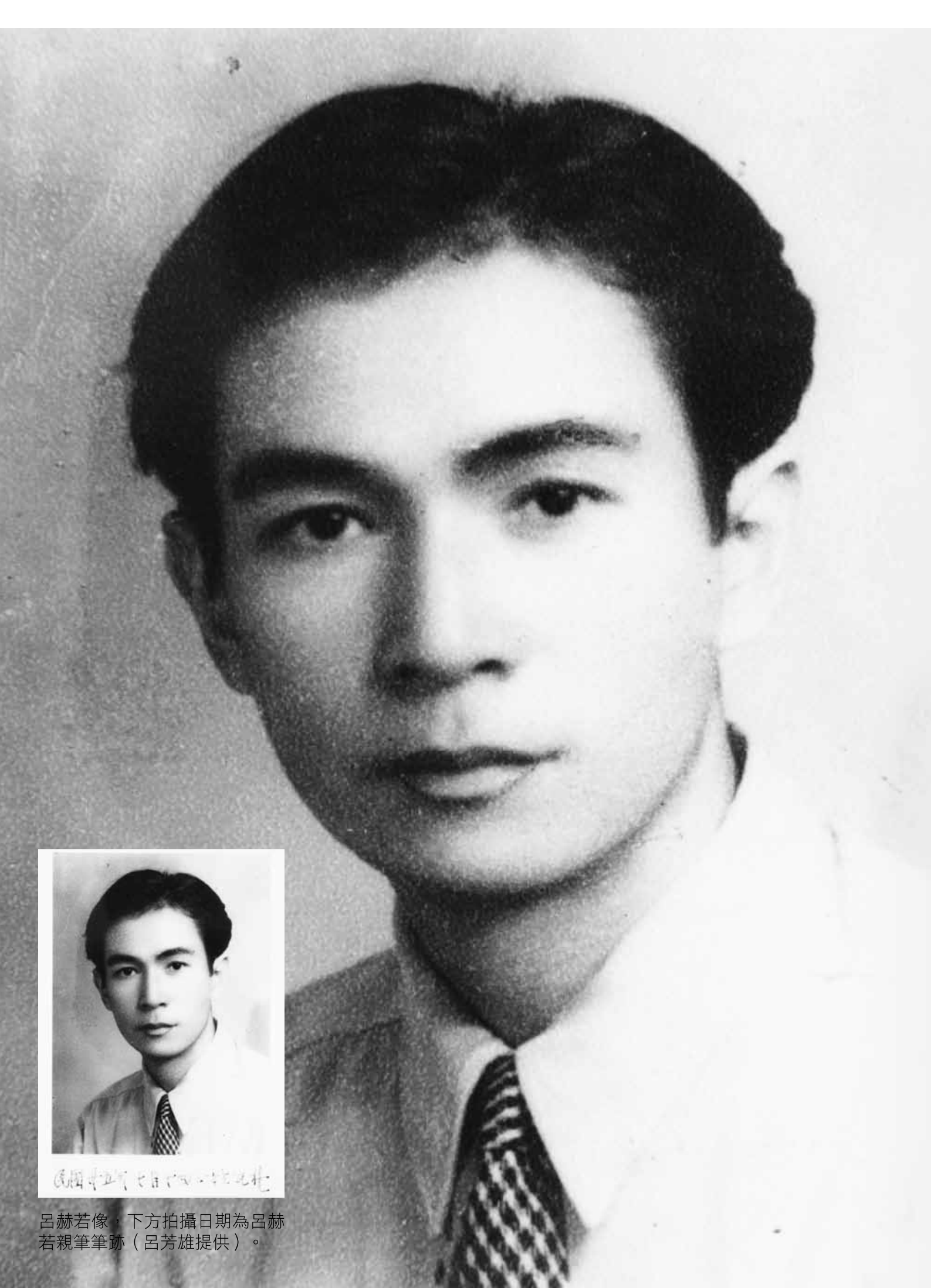




呂赫若像，下方拍攝日期為呂赫若親筆筆跡（呂芳雄提供）。

謎樣的遺憾拼圖

——呂赫若

受 難 者：呂赫若

現 況：已歿

案 件：1949～1950年「基隆中學」事件

案情概況：1949年爆發「基隆中學事件」，基隆中學校長也是《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舉報為匪諜被捕，時任《光明報》主編的呂赫若逃往臺北縣汐止石碇山區，蘇金英、陳春慶等人證實其於1950年於山區被毒蛇咬死，但始終未找到屍首。

受 訪 者：呂愛琴（呂赫若長女）、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受訪時間：2016年4月15日（呂愛琴，自宅）

2016年4月18日（呂芳雄，自宅）

採訪、撰稿：魏吟冰

story

呂赫若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生於臺中廳葫蘆墩支廳（豐原）潭仔墘區校栗林，父祖輩小有資產是當地頗具聲望的大戶人家。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執教於新竹峨眉公學校及南投營盤公學校，期間即從事小說創作，後赴日本東京深造修習聲樂，返臺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及北一女中，集「作家」、「聲樂家」、「劇作家」於一身，故有「臺灣第一才子」之封號。

呂赫若成名甚早，短篇小說〈牛車〉1935年刊登於日本《文學評論》的新年號，隨即受到臺灣及日本文壇重視。受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甚深，作品多觸及「階級」與「性別」，對底層勞動者及封建社會桎梏的女性深有描述及同情。「呂赫若」筆名，日文之意是期許自己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1942年自日本返臺後，積極投入臺灣文壇活動，加入《臺灣文學》編輯，並擔任「臺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也為「臺灣演劇協會」撰寫大眾劇本及廣播劇。1943年更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臺灣文學賞」。終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1945年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於次年一月擔任《人民導報》記者，1948年任《光明報》主編，對時局常有針砭，更變賣祖產成立「大安印版所」印行地下宣傳文件。

1949年發布戒嚴令，《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捕，呂赫若展開逃亡，躲在石碇山區，據當地人士證實1950年不幸於山區遭毒蛇咬死，走完熾熱卻短暫的一生。其妻、其子、其女則身受白色恐怖之苦。

受訪者：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才子光環下的「冬夜」生活

我叫呂芳雄，1942年出生於臺中潭子校栗林曾祖父所建的「建義堂」。對父親的感受，如同我於〈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中文末所寫：「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過他的人生，但卻留給他的家屬寒冷又黑暗的『冬夜』^{（註1）}生活」。小時候大略知道父親是聲樂家，也寫過小說，但完全不知道父親有「臺灣第一才子」的稱號及在臺灣文壇的重要性。這些都是在我四十歲以後，接觸白色恐怖的田野訪查，參與研究父親的相關研討會、紀念活動後才陸續瞭解。我很尊敬父親在專業上的成就與貢獻，但作為他的子女要很真實的說：「父親一生最沒有付出的就是他的家庭」。



呂赫若次子呂芳雄，是呂家子女中最深入瞭解父親生平的作品與生活（楊士賢攝影）。



呂赫若全家合影（呂芳雄提供）。

我的童年生活

1942年父親決定自日本返臺，母親在懷了身孕下顛簸坐船，回到臺灣在潭子生下了次子的我，我上有大哥芳卿、大姊愛琴、二姊田鶴及五歲因病過世的三姐緋沙子^{（註2）}。下有芳傑、芳甫、芳伯、芳民四位弟弟。童年印象已模糊，在潭子生活的期間，叔公呂坤霖很喜歡抱我外出，遇到鄰人或朋友都會稱讚我長得很好。物質生活過得很優渥，雨天同齡小孩還在穿蓑衣時，我們已經穿雨衣了，在當時可說是相當罕見。

父親在家中絕口不提在外面從事的活動，雖然友人如音樂家呂泉生等也都來過家中，但朋友來時父親均不讓母親及小孩出來。所以，對於父親的朋友認識得極少。在潭子生活了一陣子就舉家搬到臺北，國小一年級唸的是臺北市的東門國小，1950年父親遇難時，我還不滿八歲，應該是國小二年級，八歲的小孩能有什麼記憶，只記得很快我們就搬回豐原社口的外婆家。之後，隱約記得聽人說過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從未聽母親提過。關於父親的很多事，都是後來才從舅舅林永南那得知。

1950年父親出事逃亡後，在那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年代，除了舅舅林永南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往來的親友幾乎不敢靠近。分別就讀北一女初中三年級的大姊，與讀成功初中二年級的大哥深受其害，不僅曾被情治人員拷問追查父親下落，兩人也皆斷送升學之路。舅舅林永南也無辜受到牽連，被關了將近一年才遭釋放。也因此，親友更是敬而遠之，每年過年農曆初二回娘家的日子，母親按例邀請父親的大姊到家裡來，我也曾經跟母親同往，印象中姑媽反應稍嫌冷淡，感覺就是應酬一下，當然也從未真正來過家裡，那個時代發生這種情形完全可以理解。這期間，舅舅林永南雖然也換來牢獄之災，但出獄後仍是無怨無悔照顧我們這一群年幼的外甥，尤其他從事藥品生意，經濟較過得去，資助我家生活及弟弟們的學費，這一路的不離不棄都令我們感念在心。

童年就在豐原社口外婆家渡過，初中考上豐原初級商業職業學校，那時情勢比較和緩了，沒遇到當初大哥從臺北成功中學要轉學臺中一中時沒人敢當保證人的慘況，姨丈做了我入學的保證人。畢業後，十六歲就隻身來臺北工作了。

三十二歲，尋訪的起始——鹿窟生死之謎

關於父親，在家裡就是禁忌，雖多少有聽過一些傳聞，但沒人會問也沒人會提。第一次尋找父親埋屍之地，是因三十二歲時接到姑丈劉興城的來信。劉興城是父親的妹妹——來于姑媽的先生，家中務農田產不少，因需人手幫忙，新聘一名長工，沒想到隨後軍方來抓人，指稱那人是二二八事件後的逃亡者。軍方誣指姑丈為同夥，1950年代期間也被抓入獄關了十年。獄中，姑丈剛好跟鹿窟事件被捕的蘇金英關在一起，蘇金英談到親眼目睹父親被毒蛇咬死的

過程。出獄後，姑丈才會來信叫我去找蘇金英瞭解這一段過程。

還記得我騎了Vespa，獨自前往汐止石碇山區找蘇金英，當時他喝了點酒，跟他表明來意後，他打死也不承認認識我父親。我拿了姑丈寫的信，再把身分證拿出來讓他再三確認我的確是呂赫若的兒子，才願意跟我談起父親種種。石碇山區群山環繞，他指著隔著一條溪旁的山跟我說，父親就葬在那裡。他親口證實目睹父親被毒蛇龜殼花咬到，當時還找來陳春慶、王文山等人一起幫忙抬往山下就醫，但最後還是沒救回來。之後，他們找了一棵大樹把父親埋了，並找一塊大石頭作記號。那年代逃亡的人，沒有人敢用真名，據蘇金英的描述父親當時自稱「王仔」^(註3)。事隔多年，四十歲左右（約1982、83年），認識了做白色恐怖田野調查的藍博洲，曾經開著我的雷諾九號到過好幾次鹿窟。之後，也跟大哥、四弟共同前去，那裡都是荒煙蔓草，也沒找到蘇金英所說為父親所立的大石頭。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確切的證據證實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在我心中90%相信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說法。



呂赫若生前所穿之衣物（呂芳雄提供）。

1998年的轉折——北京呂赫若研討會

雖然1980年代與藍博洲、陳映真等人接觸，開始瞭解父親的重要性，但仍僅止於聲樂家與作家的淺薄層次。直到1998年，接到陳映真的電話要我以家屬的身分去北京參加「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是研討會？更沒有參加過研討會的經驗，還跟陳映真說：「我又不會寫論文去那裡要幹麼？」陳映真要我以家屬身分出席即可。研討會為期三天，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臺灣參加的人包括陳映真、藍博洲、在淡江大學教書的李昂之姐施淑、臺灣清華大學教授呂正惠、陳萬益，還有一位牙醫師曾健民等人。

研討會是在北京的民族飯店舉行，對父親認識不深又都沒經驗的我，第一天上台沒有邏輯性的胡亂講了一通。會場上遇到全國臺聯^(註4)副會長石四皓，他還跟我說：「一般作家舉行兩天的研討會就很了不起了，對單一作家進行三天的研討會可說是絕無僅有。」什麼都不知道的我，那時還傻傻的以為全國臺聯是李登輝的那個臺聯。研討會晚上跟陳萬益老師住同一間房，又跟他多聊了父親的事。第二天，作家陳若曦女士特別來找我，表示願意將他論文發表挪出十分鐘讓給我，經過一番整理，我再一次上台發言。

回臺後，呂正惠老師鼓勵我把關於父親的東西寫下來。我還跟他說：「我不會寫，我來口述，拜託陳萬益老師博士班的學生寫下來。」但呂老師一再堅持這樣行不通，鼓勵我要自己把它寫出來。1998年北京研討會結束後，舅舅林永南的小女兒帶著子女移民澳洲，因她先生的診所在臺灣常需往返奔波，希望我能前往澳洲協助照料她的子女。就在1998到2000年往返臺灣一年多的時間中，慢慢地把追記父親的文章完成。期間，日本橫濱大學垂水千惠教授來

信，打算以父親為主題，進行博士論文的撰寫，通信過程中也讓我更瞭解父親。近一萬五千字的文章完成後，第一個拿給陳萬益老師看，經由陳老師不著痕跡略為潤飾後，並由其協助將文章名稱定為〈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父親日記的公開

父親遺留日記的公開過程則是有點曲折，大約也是1998到1999年期間，長期研究臺灣文學的張恆豪先生、日本橫濱東洋大學的野間信幸教授與清華大學的呂正惠教授等人，都希望父親遺留的日記能公開作為研究資產。當時，日記的原稿在大哥那裡，曾提供給特定學者研究。其他學術界人士覺得不盡公平，並認為日記未公開研究呂赫若就有如瞎子摸象。趁著清明回潭子掃墓，我跟母親還有大哥提起，願意用相機底片一張張將它翻拍公開。母親當時說：「不用那麼麻煩拿去影印就好。」我就帶回臺北影印裝訂成冊十本，分送給陳萬益、呂正惠等相關需要的教授，每一冊上面特別留有我的簽名，代表這是經過家屬的同意授權，不致產生版權上的問題。



左圖 呂赫若日記原稿，是在其逃亡遇難後，未被埋葬燒毀的手稿（呂芳雄提供）。

右圖 翻譯紅樓夢一直為呂赫若生前之心願，此為其遺物：增評全圖石頭記（呂芳雄提供）。

之後，日記原稿曾由呂興昌教授策劃，匯集包含父親在內的五位作家，在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2004年國立臺灣文學館將日記譯成中文，發行了〈呂赫若日記手稿本〉與〈呂赫若日記中譯本〉，讓更多研究者得以有更多的素材。目前，日記的原稿則保存在我這裡。

「赫若」筆名的由來

本名呂石堆的父親成名算很早，1935年就以「赫若」的筆名，在日本《文學評論》刊載第一篇發表的日文小說〈牛車〉。現對父親筆名「赫若」的詮釋多流傳一種說法，父親因嚮往社會主義，而各取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赫」與中國左翼作家「郭沫若」的「若」作為筆名。但就我從六叔呂如鵬（父親很敬重的叔叔呂坤霖的兒子）口中得知並非如此。

關於父親的筆名「呂赫若」，六叔曾跟我提過，父親曾親口跟他說會以「赫若」作為筆名，是希望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六叔從小跟著坤瑞叔公移居爪哇，完全不懂日文，更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就是「赫若」的日文字義。再者，父親也算成名得早，會取自同期間知名作家的名字作為筆名，在我看來並不合理。我覺得很多事情要還原到那個年代的情境來看，不能理所當然的用我們現在的認知來推斷。外界也曾傳說，辜顏碧霞女士曾駕車載父親逃亡時，看到路旁有警察，辜顏女士就跟父親講說：「你趕快開我的車先跑。」這段坊間的傳聞，我個人覺得並不真實，還原到七十幾年前的情境，汽車是很稀有的東西，會開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不太相信父親會開車，跟舅舅、六叔等長輩聊過父親，從未聽他們說過父親會開車。

父親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與共產黨員的證據

父親遺留的作品中處處可見深受社會主義思想人道關懷的影響，而最初的啟蒙者，我認為是姑丈也是二舅的林寶煙。林寶煙最初為父親堂姐呂葉的先生，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個性沉靜內向，深受當時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研讀不少相關的書籍，也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頭痛人物。個性外向活潑的父親，常往堂姐呂葉家中跑，跟堂姊夫林寶煙閒話家常。我們稱之為「阿葉姑」的呂葉，就很反對父親受到她的先生林寶煙思想上的影響，曾說：「家裡出了一個麻煩的人就夠了，不要再有第二個了。」而林寶煙也正是母親林雪絨的二哥，但父親婚前往返他的家中從未見過母親。後來，還是「阿葉姑」極力推薦自己的堂弟，以媒妁之言促成父母親的婚姻。

至於，父親是否為共產黨員，這部分我也沒有明確的證據及答案^(註5)。王曉波曾經跟我說過，父親是第一個在鹿窟升起五星旗的人；陳芳明也說父親筆名中的「赫」字有兩個「赤」字，象徵極度的左派，這些我想都屬於作家的臆測。倒是舅舅林永南曾說過，小女兒出生時請父親代為命名，父親為其起名為「可紅」，當時覺得太過敏感而未採用。

荔枝園親手埋了父親遺物

父親遇難後，我們隨即搬離臺北信義路的住處，回到豐原社口的外婆家。外婆雖然沒唸過什麼書，也是觀念傳統的女性，但在家中頗具威嚴及分量，父親對於岳母也是相當敬重。搬回鄉下的物品，除了母親的嫁妝及生活用品外，也有父親留下的手稿、書籍、衣服、自行車等。因時機敏感，外婆擔心這些東西會帶來更大傷

害，手稿及書籍就叫我跟大哥在家中前面的荔枝園中挖了坑埋進去，埋好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唯一倖存的一本日記，是因為裡面記載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在母親的堅持下而被保留下來。其他相關物品，我記得是用類似烤魚的架子，木製但中間挖空上面再置放圓形金屬鐵架的火爐，都把它毀掉了。

父親其他遺物的去處

父親當年匆忙逃亡，但期間曾經冒險回到舅舅林永南家中看望即將臨盆的母親，最小的弟弟芳民也在那次探望的一星期後出生。事後聽母親說，那次碰面，父親或許有逃亡生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準備，特別跟母親交代一些存放在朋友處的物品。像是音樂方面專用的唱片曾交由一位著名的音樂家保管，之後母親曾帶著大姊愛琴到中山北路六條通該位先生的住處，對方當場表示並不認識母親，父親也未寄放相關唱片，母親也只能無奈離去。



呂赫若之遺物：包含本人呂石堆、太太林雪絨、父親呂坤霖之印章（呂芳雄提供）。

也曾聽舅舅說過，前輩畫家李石樵也有父親存放的遺物。舅舅曾去找過李石樵先生，他也說父親的確存放了一些物品在他家。當時，他住的是日式房舍，日本式的房屋一進玄關脫掉鞋子後，就需要走幾階路上到正式的屋內，形成落差約一公尺左右的高度及空間，李石樵先生對舅舅說父親的遺物就塞在那空間裡面，請舅舅有空過去拿。後來舅舅可能因工作太忙也忘記了，想到要再去拿時，房子已經翻修，李石樵先生表示並未注意到那批遺物，可能在翻修的過程被建築工人給清掉了。

留在家中的就是照片跟零星的小物品，之後各自散落在我們兄弟處，但以前的年代沒有遺物保存的觀念。後來，曾遇過陳澄波的家屬，得知他們並不忌諱臺灣民間習俗，仍珍惜保存著陳澄波先生受難被槍決時沾滿血漬的囚衣，讓我深受震撼也非常敬佩。之後，曾以資助三弟的方式，陸續取得父親的一些遺物。

存放在我這裡的照片，早期也發生過被相關研究者借走而未歸還之事。其中，有三張照片我覺得特別可惜，那是父親在日本的「日比谷劇場」演出的照片。當時透過父親故人介紹而認識鼎鼎大名的臺灣文學界前輩，他看過照片後，希望商借其中的三張，我把相片送到陽明山給他。但自此之後，這位前輩就再也沒有歸還照片了。

呂赫若遺物鋼琴煙盒，以當時來說是相當精緻的物品（呂芳雄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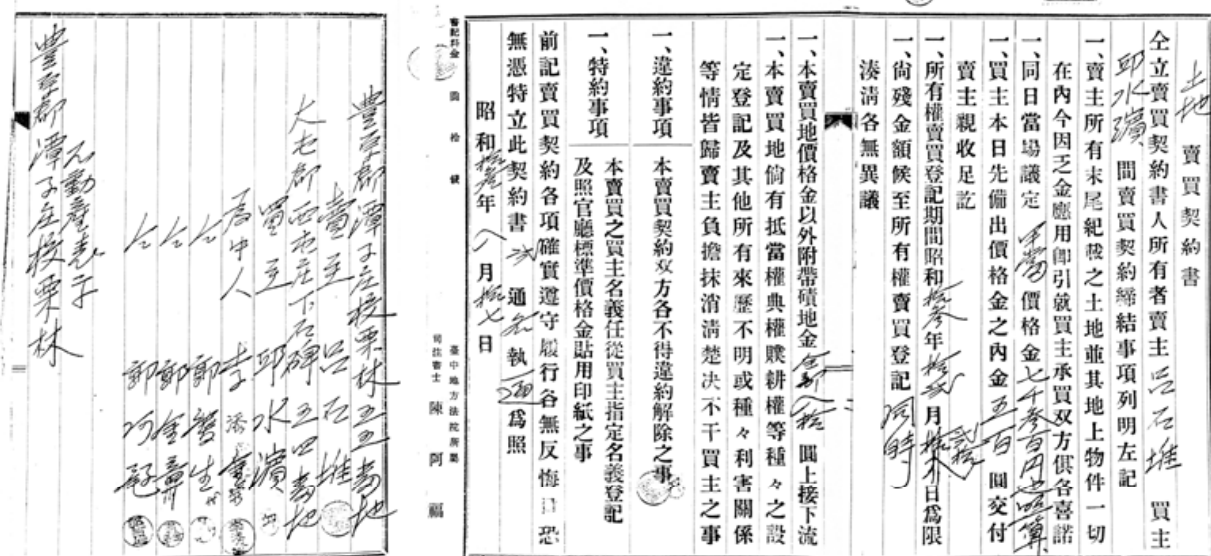


那幾張之所以特別珍貴，是照片下方還留有父親親筆簽名演出的日期與地點。西元2000年協助公共電視拍攝作家身影時，曾經詢問過日本「日比谷劇場」父親的演出紀錄，並未查到父親在日比谷的演出場次，但從照片裡呈現的空間、人物及留有父親的簽名來看，的確是在「日比谷劇場」沒錯，推測可能是父親當時的演出並非「日比谷劇場」正式的演出場次，所以並未正式列入紀錄。

關於「大安印版所」

父親約於1949年開設經營「大安印版所」，出版一般的樂譜、童書，它更重要是印行地下刊物的宣傳文件。坊間常聽到的說法是，「大安印版所」是由辜顏碧霞女士出資成立，但據我所知並非如此。它是父親於1948年的十月出售祖父遺留下來的房產「建義堂」所得後而獨資經營。這也是父親第二次變賣祖產，第一次是於1938年（昭和13年）的8月，祖父呂坤霖過世，為償還祖父所遺留下來的債務，把祖父在「建成堂」房地所分配到的產權賣掉，這部分我手上都還留有當時買賣的影印文件。話再說回來，成立不到一年的「大安印版所」即因情勢緊張而結束營業。

根據母親的回憶，在傳出父親被毒蛇咬死的事件後，母親接到了「保安司令部」通知說父親案件已結案，要母親前去領回物品。在舅媽陪同下母親到了「保安司令部」，承辦人員向母親說，父親已在臺北縣石碇山區被毒蛇咬死，案件結案。但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母親簽署一份放棄「大安印版所」的產權聲明，當時白色恐怖的陰影依然籠罩，那樣的局勢下也讓母親不得不簽署。至此，「大安印版所」的土地及房屋所有權再也拿不回來了。



1938年（昭和13年），呂赫若父親過世，為償還父親生前債務，變賣繼承的房地產權，此為買賣契約（呂芳雄提供）。

父親、母親與蘇玉蘭

父親與母親的婚姻是因為父親堂姐呂葉的媒妁之言而促成，母親林雪絨的家族為豐原社口「大夫第」的家族，是地方上的望族。母親是極為傳統溫柔的女性，相夫教子三從四德，而父親在家中則是大男人主義者，父親帶朋友回家從不讓母親在場，母親也未曾主動過問父親在外的交友與生活。結婚後，陸續生育六子三女的母親，多半時間為了子女照養問題就已忙碌不堪，與父親的互動也集中在家庭生活、子女教養等問題上。父親走後，母親鮮少主動提起父親，偶而遇到小時候我們不聽話時，才會說：「要是你父親在的話，你們絕對會被修理一頓。」關於父親的一切，好長一段時間成了家中的禁忌話題，直到解嚴後風氣漸開，才會從母親口中聽到父親的事，但講得仍是相當有限。

從小，我們兄弟姐妹大概就知道父親有個「細姨」，但沒人敢問也沒人會說。成年後，才從舅舅那聽說那女子名為蘇玉蘭，是父

親於「興行統制會社」工作期間所認識，與父親生有一子一女，後因生活困苦另嫁他人。約三十年前，同父異母的妹妹朱麗玉找到了我，提到另一位弟弟成年後因意外而喪生，也跟我說起住在萬華的媽媽蘇玉蘭身體並不好，我還曾經去醫院探望。我也告訴妹妹朱麗玉，那些恩恩怨怨都是上一代的問題，並不是你的錯，她跟先生也曾到潭子呂家祖墳掃墓。直到現在，我們都還保持不錯的關係，每年都會聯絡。

隨著解嚴後社會風氣開放，父親不再是個禁忌的人物，研究者與媒體報導愈來愈多，多年前曾有媒體曾訪問蘇玉蘭女士，文中稱她為呂赫若遺孀，並表示父親另有原配。這樣的說法對我母親極度不尊重，我是完全無法接受。

未獲賠償的冤案

大約2005年左右，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提出父親冤案的賠償申請，與行政院公文往返近一年，最後仍無疾而終，終究未獲得任何賠償^(註6)。



右圖 呂赫若的父親呂坤霖所建之建義堂（呂芳雄提供）。

左圖 呂赫若全家合影，座排中為呂之岳母，呂赫若么子在他逃亡一週後才出世，未在其中（呂芳雄提供）。



- 左上 呂赫若長女呂愛琴，父親遇難時就讀北一女中初中部三年級，曾被情治人員抓走拷問父親下落（楊士賢攝影）。
- 右上 因申請冤獄賠償與行政院的公文往返（呂芳雄提供）。
- 下圖 呂赫若祖父所建之祖宅建成堂，也是呂赫若出生地（呂芳雄提供）。

受訪者：呂愛琴（呂赫若長女）

我是呂愛琴，1935年墩仔腳（后里）大地震後，出生於臺中潭子校栗林家族的祖厝「建成堂」，出生後餘震不斷，一遇到地震大家都急著往外跑，跑出戶外才想到還有一個嬰兒被留在家中，急忙再衝進家中把我抱出來。這是我出生的故事。

我的父親印象

因是家中長女，與父親的相處要比其他弟妹來得多，現在已是高齡，久遠的童年記憶已模糊，腦中留有的父親印象也不算清晰。我是在潭子國小讀書入學，上學的同伴就是愛治姐，（愛治姐是大伯呂石墩的女兒，大我六歲左右，因大伯早逝，伯母改嫁，愛治姐幾乎都跟著我們一起生活），父親每天都會給我們零用錢五分錢，其中一分錢我跟愛治姐都拿去買蚵嗲，我還記得蚵嗲上面都有紅紅的蝦子。

潭子國小入學不久，父親即遠赴東京繼續修習聲樂，母親、大弟芳卿、我與三妹緋沙子也陸續到東京與父親一起生活^{（註7）}。父親本來要愛治姐獨自前往東京，已買好潭子到基隆的車票，再由基隆前往東京的船票，到了東京父親再去碼頭接她，但愛治姐最後因不敢獨自遠行而未到東京。在臺灣沒唸幼稚園的我完全不懂日語，上學也常常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有次學校遠足活動，我先跑去上廁所，沒想到上完廁所回來隊伍已經出發了，我只好站在原地傻傻地等，心裡又很擔心會被老師責罵，沒想到老師回來找到我時非常慈祥，詢問有沒有受到驚嚇，這是我在日本短暫生活中記憶很深的事。

住在日本期間，父親會帶我出去，日本冬天很冷，他通常都會穿著長大衣，有時走路、有時坐電車，到底是去看戲劇還是聽音樂，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每次去都會走進一個有門簾的地方，裡面就有熱熱的紅豆湯喝，喝完整個人就會很暖和。散場已經很晚了，父親就會小心牽著我的手走路回家。

在日本東京唸了國小一、二年級後，因時局混亂，父親在坤瑞叔公三通電報的催促下舉家坐船返臺。回到臺灣一下船後，就聽說我們的下一班船在海上被美軍炸沉，回想起來真的是很幸運。回臺後，父親雖然經常不在家，但對我們非常好也很細心。國小的課本、作業簿每一本父親都會親筆幫我寫上「呂愛琴」，甚至當時小學生用的竹尺，父親也是親手用鋼筆寫上我的名字。印象中，他也曾帶我們去臺中公園划過船，還看過布袋戲，偶而他帶我到朋友家中，也會跟朋友說：「這個女兒以後是要唸臺中女中的。」父親個性外向活潑結交了很多朋友，但在家中生活頗為嚴謹，每天早上五點多就起床做發聲練習，還曾經為了此事惹來鄰居的抗議；寫作的時間則都利用晚上安靜的時間進行。



多才多藝的呂赫若，也親手雕塑大象書架（呂芳雄提供）。



呂赫若擔任第二屆臺灣省音樂比賽的評審徽章（呂芳雄提供）。



呂赫若任教北一女中及建國中學時留下的徽章（正面）（呂芳雄提供）。



臺灣文化協進會贈送徽章（呂芳雄提供）。



徽章背面分別標註教職員與學生的身分（呂芳雄提供）。

三妹緋沙子聰明又活潑也很愛唱歌，她的死對父親來說應是一輩子的痛，緋沙子過世那天，我在學校的賽跑比賽跑了第一名，還沉浸在高興的情緒中，沒想到就有同學走過來說：「妳高興什麼？妳妹妹死了。」我一時也無法意會及接受，雖然之前緋沙子就因病住院，也曾到臺大醫院探望過她，但完全沒想到最終的結果會是如此。出殯時我送了妹妹一小段路程，父親則是悲傷地送完妹妹全程，結束她天使般短暫的人間生活。

可能遺傳到父親音樂的專長，從小我也很喜歡唱歌，學校的戲劇或話劇比賽，雖然我都不是在台上表演的人，但幕後主唱一定是我。愛唱歌的我也常常會在家裡哼唱，但遇到在哼唱日文歌曲時，父親總會禁止我。



呂赫若於營盤公學校執教時師生合影，前排左三為呂赫若（呂芳雄提供）。

物質優渥卻不快樂的童年生活

小時候我們的物質生活，相對於同齡的孩子來說好很多。國小時我是班上唯一穿鞋子跟襪子的人，現在很有名的「犁記餅店」，離外婆家不遠，當時還是一間小餅店，小時候我們就吃過了；初中進了北一女中，西裝外套也都是特別請師傅訂做，家中黏相片的相本也是那種絲綢蕾絲的材質。物質生活過得可說是相當優渥。

但因父親工作的關係經常搬遷常常得轉學，一轉學就又要面對新環境，對一個孩子來說得不停適應，老實說這讓我覺得童年生活並不快樂。國小在潭子國小入學，不久後就去東京唸了一、二年

級，回臺灣後先轉回潭子國小，隔沒一陣子又轉到臺北士林國小讀完三、四年級，沒多久又被轉回潭子國小，最後畢業則是在臺北的東門國小。國小六年就轉學唸了六個學校，其中光是潭子國小轉進轉出的就唸了三次，我都感覺得到老師好像不太高興。

父親經常在外，母親獨自養育眾多子女，身為長女的我也需擔起幫忙照顧弟妹的工作。從小，我功課不錯，初中也順利考上北一女中，在家讀書寫作業時，母親有時會說：「又在唸書了！又在寫字了！」但因為不服輸的個性，都會抓緊空檔時間唸書。印象中，回到外婆家是最快樂的時光，那裡有三個尚未出嫁的阿姨會陪我們玩，阿姨們也都擅長裁縫烹飪，回去時就會煮好吃的給我們吃，做新衣服給我們穿。



據呂赫若長女呂愛琴回憶，每年幾乎都會由叔公召集，拍攝家族合照，後排左八抱孩者為呂赫若（呂芳雄提供）。

十五歲那場拷問 影響了我的一生

父親的逃亡與遇難是我唸北一女初中部三年級時的事，在那之前的二二八事件我也留有一些殘存的印象。當時，我們住在臺北的信義路，父親不在母親也回鄉下外婆家，只剩我跟愛治姐在家中。我們住在日式房舍，因為害怕，有幾天都躲在塌塌米下方的儲藏空間裡面，肚子餓了就吃粳粽磨成的粉，至於粳粽磨的粉可能是外婆留下來的，這部分的細節就有點忘記了。

十五歲那年，我唸北一女中初中部三年級，我跟大弟芳卿也因父親的事件被抓拷問了一段時間，幾天？還是好幾個星期？具體的時間已記不清楚。只記得被抓進去的地方，一起關了七、八個人左右，當時小小年紀覺得那環境很可怕，要把妳帶出去時就用毛巾摀著眼睛叫妳上車，去到哪裡也不知道。我還記得被帶到一個像三合院的地方，中間有一大塊草地，隔著窗戶，我看到舅舅在對面，有人抓著他的海角仔頭（西裝頭）強行灌水進去，同時間我這邊的人就會跟我說：「你趕快說出你爸爸在哪裡？你舅舅就不會被這樣對待了！」我就說：「我真的不知道。」舅舅就又會被強行灌水到整個人體力不支。就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每天被逼問父親的下落。送飯來時完全吃不下，只覺得怎麼又要吃飯了，從來沒對吃飯覺得這麼討厭過。這段經歷，真的是人生中很可怕的記憶。

從我們口中問不出父親下落後，只好把我跟大弟放出來。回到學校上課，我覺得很奇怪的是老師、同學都沒有問我這段時間去哪裡了？平時請假一天都要寫假單，但好幾天甚至兩三個禮拜不在，老師竟然毫無反應，當時的我對這情形也覺得很困惑！事件發生當時，我已經快接近畢業了，本來我根本不想繼續唸了，是舅舅跟我說只剩一點點時間還是要唸到畢業，我才勉強撐起精神唸到畢業，

但連畢業典禮也沒去，就回豐原社口的外婆家了。如果沒有父親遇難的這段際遇，我想我是一定會繼續升學的，但人生什麼事都很難說。問我會不會因此後悔沒繼續升學？當時，我只覺得除了「平安」，什麼都不重要了。畢業後，就在親戚介紹的醫院從事護理工作，結婚之後，就在家中也沒再出外工作了。

註1：〈冬夜〉是呂赫若於1947年2月5日刊載於《臺灣文化》第2卷第1期的最後一篇中文小說。

註2：呂赫若與林雪絨育有六子三女，三女緋沙子於1944年病逝於臺大醫院，呂赫若日記中經常提起緋沙子聰明可愛，根據受訪者〈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中提及呂赫若以〈星星〉為題，寫下懷念緋沙子的悲傷心情。但此小說並未發表，呂赫若遇難後受訪者在外祖母的指示下，親手在荔枝園挖了坑埋了父親留下來的文稿和書籍，其中也包含這篇從未發表過的〈星星〉。

註3：「鹿窟事件」受難者李石城於《鹿窟風雲——八十憶往 李石城回憶錄》一書中，頁52-54中提到13歲時見過的「潘老師」，後來經獄友告知即為呂赫若。此與受訪者聽蘇金英稱父親為「王仔」，有稱呼說法上的不同。

註4：「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臺聯」，於1981年12月27日成立，是臺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同鄉會組織。

註5：張炎憲於1998年所做「鹿窟事件調查研究」中指出，呂赫若是左傾的知識分子，但是否為共產黨員則沒有檔案上的證據。

註6：呂赫若四子呂芳甫認為應是呂赫若並未入獄導致此案並未成案而未獲賠償；受訪者次子呂芳雄則是提到他們不懂法律程序，也未聘律師進行相關事宜，致使本案最終因相關格式不符而無疾而終。

註7：依受訪者說法，與父親到東京生活的弟妹為大弟芳卿與三妹緋沙子，並不包括二妹田鶴子。但《呂赫若日記》中，1942年的東京生活，卻多次提到次女田鶴子。此應為受訪者記憶有誤。